

# 對比解讀生態翻譯學的兩個核心概念\*

蔣驍華

---

**[提要]** “生態”和“適應-選擇”是生態翻譯學的兩個核心概念，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礎，是這一理論最基本的特色。鑒於這兩個概念分別與文學生態批評的“生態”和語用順應論的“順應”、“選擇”存在某些相似點，本文以對比解讀的方式仔細甄別它們之間的異同，以便進一步瞭解生態翻譯學的內涵。

**[關鍵詞]** 生態 適應-選擇 生態翻譯學 對比解讀

**[中圖分類號]** H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3 - 0145 - 07

---

“生態”(eco)和“適應-選擇”(adaption-selection)是生態翻譯學兩個核心概念。“生態”是生態翻譯學的基色(基本色調)、出發點和視角;“適應-選擇”是生態翻譯學的學理支柱與操作模式。準確理解這兩個概念,對瞭解或研究生態翻譯學至關重要。而早在生態翻譯學誕生之前,“生態”和“適(順)應”、“選擇”這些概念已分別被文學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和語用學中的順應論(adaptation theory)使用,並造成廣泛影響。那麼,生態翻譯學中的“生態”與生態批評中的“生態”,生態翻譯學中的“適應-選擇”與順應論中的“順應”(adaptation)、“選擇”(choice-making/making choices),究竟有何異同?本文試以對比的方式逐一解讀。

## 一、生態翻譯學之“生態”與生態批評之“生態”

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肇始於2001年,快速發展於2009年,到2010年已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標誌性的事件是2010年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的成立和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的召開。鑒於文學批評中的“生態批評”理論已在外語界造成廣泛影響,我們有必要將生態翻譯學的“生態”與生態批評的“生態”作一番比較和甄別。

先看生態翻譯學之“生態”:

---

\* 本文係澳門理工學院科研項目“翻譯學學派研究:‘生態翻譯學派’透視”(編號:RP/ESLT-06/2009)的階段性成果。

1. 取法“自然生態”，即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之間存在“關聯性”、“類似性”、“同構性”。<sup>①</sup>所謂“關聯性”，是指在“翻譯←→語言←→文化←→人類←→自然界”這條“關聯序鏈”中，翻譯與自然界存在著“互聯關係”。具體地說，從“翻譯”與語言的密切關係一步步往前推，可以推到“自然界”；反過來，從“自然界”與人類的密切關係一步步往前推，可以推到“翻譯”。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之間的“類似性”可概括為：（1）自然生態中的生態環境與各生物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翻譯生態中的“翻譯生態環境”與和翻譯相關的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2）在自然界，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達到一定的和諧與平衡；在翻譯中，譯者與和翻譯相關的各因素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一定的和諧與平衡。

（3）在自然界，不同生物之間存在一種互利共生的互惠關係；在翻譯中，譯者有目的的翻譯活動，會改善與翻譯活動相關的某些因素，進而促成翻譯因素間互利互惠。（4）競爭排斥原則既適用於自然界，也適用於翻譯界。（5）自然界和翻譯界都按“適應”、“選擇”、“生存”、“淘汰”的方式運作。（6）從總體上看，自然界與翻譯界具有“家族相似性”，即兩個不同的系統（家族）之間具有相似性。<sup>②</sup>所謂“同構性”，是指“適者生存”、“汰弱留強”法則既是自然生態法則，也是翻譯生態法則。

2. 立足之核心哲學基礎：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sup>③</sup>

3. 運用生態理性。胡庚申概括出的生態理性包括：注重整體/關聯，講求動態/平衡，體現生態美等，觀照“翻譯群落”，倡導多樣/統一等。<sup>④</sup>

4. 借助中國古典生態觀。胡庚申認為，“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為本”等中國經典哲思就是一種強調“天和”、“人和”、“心和”的生態智慧。<sup>⑤</sup>其實，老子明確表示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⑥</sup>那統領天地萬物、“玄之又玄”、不可名、不可道的“道”最終還得“法自然”。可見，中國人早就懂得“自然法則是宇宙的最高法則”。生態智慧早已深入華夏文明的核心。中國古典生態哲思是生態翻譯學之“生態”的另一個哲學基礎。

再看生態批評之“生態”：

1. 以“自然生態”為價值標準。生態批評（ecocriticism）<sup>⑦</sup>是上世紀90年代興起於英美的文學批評理論。它通過文學文本考察人類文明與大自然的關係。它不僅要解救作為人的生存環境的大自然，還要還人性以自然，從而解決人的異化問題。它的最終目的是，重新構建人與自然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和諧統一。生態批評是對文學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的探究。它以美國生態哲學家H. Rolston生態整體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Rolston繼承了Leopold的大地倫理思想，把“不破壞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動態平衡、保護物種的多樣性作為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將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和內在規律作為人類一切觀念、行為和生活方式及發展模式的根本出發點，作為衡量萬物和人類自身需求和發展的尺度。<sup>⑧</sup>生態批評將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文化間的衝突和人類與大自然（包括動物）的嚴重對立。

2. 立足之核心哲學基礎：“現代之後”的生態主義<sup>⑨</sup>，即科技的高速發展既給我們帶來了巨大利益，也給自然生態帶來了嚴重威脅。

3. 借助中國古典生態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國古典生態觀是其另一個哲學基礎。<sup>⑩</sup>被批評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人是萬物的尺度”，“人為自然立法”等自然觀。

4. 發展出多層面的“生態倫理”：（1）Rolston的“保護價值”；（2）Schweitzer的敬畏生

命倫理；（3）Leopold的大地倫理；（4）生態倫理的自身悖論。<sup>⑩</sup>

概括起來，生態翻譯學的“生態”與生態批評的“生態”的主要相同點是：都借助了中國傳統生態觀。主要不同點是：（1）“生態”在生態翻譯學中是“喻指”，而在生態批評中是“實指”。換言之，“自然生態”在生態翻譯學中是一個比喻和類比，即將翻譯中的“適應”、“選擇”、“適者生存”、“汰弱留強”等現象與自然生態中的“適應”、“選擇”、“適者生存”、“汰弱留強”等現象相類比。翻譯是“本體”，自然生態是“喻體”。在生態批評中，“自然生態”是一個實際的價值判斷標準。（2）核心哲學基礎不同。生態翻譯學的“生態”立足於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生態批評的“生態”立足於“現代之後”的生態主義。（3）生態批評的“生態”已發展出多層面的“生態倫理”；生態翻譯學中的“生態”翻譯倫理尚待進一步發展。<sup>⑪</sup>

## 二、生態翻譯學之“適應—選擇”與順應論之“順應”、“選擇”

“順應”（adaptation）、“選擇”（choice-making）本是語用學中的概念，後因中國譯界有人拿來研究翻譯，因而，翻譯研究中有一與生態翻譯學之“適應—選擇”模式較為接近的“選擇與順應”模式。這二者之間有什麼異同呢？

### （一）生態翻譯學之“適應—選擇”

生態翻譯學從譯者的“適應”與“選擇”的視角解讀翻譯過程，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和譯文所處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託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包含了原文和譯文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翻譯生態環境”的概念要比翻譯的“語境”更寬泛一些。<sup>⑫</sup>生態翻譯學中的“適應—選擇”，重點考察翻譯過程中譯者的“選擇性適應”和譯者的“適應性選擇”問題。對譯者來說，既要適應，又要選擇，適應中有選擇，選擇中有適應。這種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具體特徵：一是“適應”，即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原文和譯文所處的世界）；二是“選擇”，即譯者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後對譯文的言語和風格進行選擇。翻譯被描述為譯者適應和譯者選擇的交替循環過程。這一循環過程內部的關係是：適應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適應的手段是優化選擇；而選擇的法則是“汰弱留強”。<sup>⑬</sup>

### （二）順應論之“順應”與“選擇”

維索爾倫（Verschuieren）根據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認識論提出了語用學的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sup>⑭</sup>，中文一般稱為“順應論”。維索爾倫認為，語言具有三個特性：變異性（variability）、商討性（negotiability）及順應性（adaptability）。<sup>⑮</sup>他還認為，在交際過程中，無論是口頭交際還是書面交際，交際者都會有意識地或主動地將受眾的接受能力考慮在內，以保證自己的意圖通過話語或文字成功傳達給受眾。維索爾倫的“順應”包括：結構客體順應、語境因素關係順應、動態過程順應、順應過程的意識程度。順應論的核心是順應的動態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維索爾倫的語用觀認為，“使用語言，實際上就是對它進行連續不斷的選擇，這種選擇，有的是有意識的，有的是無意識的，有的是出於語言內部（即結構）的原因，有的是出於語言外部的原因”（using language must consist of the continuous making of linguistic choice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for language-internal (i.e. structural) and/or language-external reasons）。<sup>⑯</sup>

順應論深入系統地研究了交際中語言使用者如何不斷的進行語言選擇以順應交際的需要。換言之，人們使用語言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選擇語言以順應語言語境與交際語境的過程。<sup>⑧</sup>因此，翻譯的過程可描述為譯者為順應交際的需要而不斷進行言語選擇的過程。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維索爾倫本人在其順應論中並未提出過“選擇與順應”這個翻譯模式。

概括起來，生態翻譯學之“適應-選擇”（adaptation-selection）與順應論之“順應”（adaptation）、“選擇”（choice-making）的主要相同點是：（1）哲學基礎均為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2）使用了相同的英文字眼adaptation和中文字眼“選擇”。而且，二者都強調adaptation和selection（choice-making）之間的關係是多維的、雙向的、動態的。<sup>⑨</sup>（3）“適應”和“順應”無本質區別。從字面上看，“適應”比“順應”稍顯主動一點，但生態翻譯學和順應論一樣都特別強調要主動去適應（順應）。主要不同點是：（1）生態翻譯學的哲學基礎，除了生物進化論，還借助了中國古典生態觀，利用了生態理性。順應論的思想得益於生物進化論中的自然選擇論，更具體地說，它與達爾文的“進化認識論”（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和皮亞傑（Piaget）心理學的“順應觀”以及維果茨基（Vygotsky）的心理發展觀關係更為緊密。所以“順應論”把“社會心智”（mind in society）和“意識突顯”（salience）作為兩個關鍵字。<sup>⑩</sup>（2）生態翻譯學的adaptation-selection與順應論的adaptation、choice-making都提到“適應（順應）”與“選擇”是相互交替、相互促進的。但生態翻譯學更強調“先適應後選擇”，因而，adaptation在前，selection在後。順應論更強調“為適（順）應而選擇”，語言選擇是其研究重心，因而，中國學者在將順應論用於翻譯研究時，認為翻譯就是“選擇與順應”<sup>⑪</sup>，即making choices在前，adaptation在後。

據筆者研究，胡庚申提出“適應與選擇”或“適應-選擇”翻譯模式在先<sup>⑫</sup>，國內譯界學者從維索爾倫的語用順應論演繹或總結出“選擇與順應”翻譯模式在後。考察2003年前後的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後者很可能受到前者的啟發或受惠於前者。宋志平於2004年發表在《中國翻譯》第2期的“翻譯：選擇與順應——語用順應論翻譯研究”是國內最早從維索爾倫的語用順應論角度研究翻譯並使用了“翻譯：選擇與順應”模式的文章（比宋更早、但未公開發表的類似研究有：2002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全小敏的碩士論文，2003年暨南大學李錦的碩士論文。這兩篇論文均未提出“翻譯：選擇與順應”模式或類似模式）。此後，很多人將順應論的“選擇與順應”模式用於翻譯研究。（3）生態翻譯學中的譯者要適應的是翻譯生態環境；順應論中的交際者要適（順）應的是語言語境與交際語境。（4）生態翻譯學的“選擇”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上進行，每一個維度上的具體選擇可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細化，細化的依據來自語言學研究、（跨）文化研究、交際學研究的有關成果。順應論的“選擇”指的是交際時的語言選擇和交際策略選擇，這種選擇也有豐富的內涵。<sup>⑬</sup>仔細比較，兩個“選擇”的對象和內涵差別很大。

（5）生態翻譯學的adaptation-selection是直接為翻譯研究而構建的；順應論的adaptation和choice-making是為研究語用而構建的，後被譯界詮釋並用於翻譯研究。

### 三、新發展與進一步解讀

胡庚申認為，生態翻譯學是一個具有跨學科性質的翻譯研究途徑；強調的是運用生態理性，從生態學角度對翻譯進行綜觀的整體性研究，是一個“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生態範式和研究領域。<sup>⑭</sup>很顯然，胡庚申強調的是借用（自然）生態學的視角及其某些原理來研究翻譯，因而，這

種研究具有跨學科性。王甯認為，“生態翻譯”具有本體性，即“生態”和“翻譯”是融為一體的，它與一般的翻譯不同。生態翻譯強調“從原文內在的生態結構出發來對擬翻譯作品進行選擇，並且在翻譯過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態結構來在另一種語言中進行再現。它既不片面地強調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意識，同時又對一味追求對原文的被動的‘忠實’起到抑制的作用”。<sup>⑤</sup>王甯對“生態翻譯”的解讀，發展和豐富了生態翻譯學的“生態”的內涵。遺憾的是，王甯對其提出的“原文內在的生態結構”和“原作固有的生態結構”這兩個重要概念未做任何解釋，以至我們無法確切理解何為“生態翻譯”，也無法想像在現實中如何進行“生態”翻譯。筆者認為，王甯對“生態翻譯”的解讀實際上觸及到了生態翻譯倫理，即既不像傳統翻譯倫理那樣過分強調原文的絕對權威和對原文的被動忠實，也不像後現代翻譯倫理那樣過分強調譯者的主體性或創造性；而是提倡“將原文當作先在於譯文的自然存在物，只可以根據它本來的內在結構特徵使它變得更加美好，而不可從根本上改造它，那樣一來我們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創作了”。這實際上是對傳統翻譯倫理和後現代翻譯倫理的“一個反撥”。<sup>⑥</sup>筆者認為，生態翻譯倫理強調維護原文和譯文的語言生態和文化生態，即對原文而言，譯者有責任儘量保護並傳達原文的語言生態和文化生態；對譯文而言，譯者有責任儘量使傳達過來的語言生態和文化生態適應目的語的翻譯生態環境，使譯文有良好的生命力。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態翻譯環境中的某些因素的變化，譯文失去了生命力或生命力不夠旺盛，其他譯者有責任提供能適應變化了的翻譯生態環境的譯文。語言生態和文化生態均有大小之分。大的語言生態是指大語種和小語種及瀕臨滅絕的語種的和諧共存。大的文化生態是指優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及瀕臨滅絕的文化的和諧共存。小的語言生態是指一個文本內各語言要素之間的和諧關係。小的文化生態是指一個文本內各文化要素之間的和諧關係。

## 結 語

筆者最近在百度網站上輸入關鍵字“適應—選擇”、“翻譯”，得結果4,040,000項；輸入“選擇—順應”、“翻譯”，得結果1,900,000項。在CNKI網站上輸入關鍵字“適應—選擇”、“翻譯”，得論文353篇；輸入關鍵字“選擇—順應”、“翻譯”，得論文436篇。可見，在國內翻譯研究中，“適應—選擇”模式和“選擇—順應”（或“選擇與順應”）模式均有不少人在用。從總體上看，運用生態翻譯學“適應—選擇”模式者更多。

需要提及的是，對於中外學者創立的理論，國內有不少人是兩種模式混用，如有人用“順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順應”（見北京：《中國翻譯》，2010年第4期）。這種模式顯然源自“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sup>⑦</sup>，只是將“適應”改成了“順應”。遺憾的是，這種改變在文中沒有說明，在參考文獻中也沒有顯示。

筆者以對比解讀的方式甄別了生態翻譯學中“生態”和“適應—選擇”兩個核心概念與其他相關學科類似概念的異同。希望本文能有助於進一步瞭解生態翻譯學的內涵，並期待生態翻譯學中的“生態”和“適應—選擇”的內涵有新的發展。

①②胡庚申：《翻譯生態vs自然生態：關聯性、類似性、同構性》，上海：《上海翻譯》，2010年第4期。

③Hu. G. S.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 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武漢：湖

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3~72、173~174頁。

④⑭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北京：《中國翻譯》，2011年第2期。

⑤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基礎》，南京：《外語研究》，2010年第4期。

⑥老子：《道德經》，第25章。

⑦半個多世紀以來，科技的高速發展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祉的同時，也給自然生態帶來了嚴重威脅。生態批評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它是當代生態思想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產物。1962年，美國作家Rachel Carson的*The Silent Spring*（《寂靜的春天》）一書出版，引發了全球思想界對生態危機的思考。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美國學者Joseph W. Meeker在其著作*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中首次提出“文學生態學”（literary Ecology）的概念。同年，美國文學批評家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踐》（*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次提出“生態批評”（ecocriticism）這一術語。文學的生態批評由此誕生。

⑧譚建香：《枷鎖下反叛的精靈——《野性的呼喚》之生態批評的解讀》，南京：《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⑨⑪Rigby, K. *Ecocriticism*. In Wolfreys J.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up>st</sup> Century*.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張豔梅、吳景明、蔣學傑：《生態批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⑩張豔梅、吳景明、蔣學傑：《生態批評》，第73頁。

⑫據悉，胡庚申即將出版的專著《生態翻譯學導論》中已有關於生態翻譯倫理的論述。

⑬⑰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第39頁；第42頁。

⑭參看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第3.1-3.3節。

⑮Verschueren, J. *Pragmatics as a Theory Linguistics Adaptation*.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198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London: Arnold, 1999.

⑯Verschueren對“順應性”的定義是：adaptability is the property of language which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make negotiable linguistic choices from a variabl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in such a way as to approach points of satisfaction for communicative needs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1). Adaptability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unidirectionally. The term itself may be conducive to a simplified vision of language choices being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pre-existent circumstances. That, too, is involved. But it is not where the story ends.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is that circumstances also get changed by, or adapted to, the choices that are made (Verschueren, 1999: 62). Adaptability can then be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to define four angles of investigation, to be combined whenever a linguistic phenomenon is approached pragmatically: a)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including any ingredient of 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 with which linguistic choices are interadaptable; b)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including structures at any layer or level of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principles of structuring; c) *the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the unfolding of adaptive processes in interaction; d) *the salience of adaptation processes*, the status of those processes in relation to the cognitive apparatus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 69).

⑰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55-56.

⑱Verschueren將語境分為語言語境與交際語境。語言語境包括篇內銜接（contextual cohesion）、篇際制約（intertextuality）和線性序列（sequencing）（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104-108）。交際語境則包括語言使用者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文化語境，即語篇外的文化背景，是指某一言語社團特定的社會規範和習俗。因此，文化語境應該屬於交際語境。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語言的選擇必須順應語言語境與交際語境。否則，交際失敗。將這個理論應用到翻譯研究中，我們可以說，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言語選擇必須順應語言語境與交際語境，否則，譯文失敗。

⑲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第120頁；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55-58.

⑳宋志平：《〈翻譯適應選擇論〉：一部簡約創新之作》，南京：《外語研究》，2007年第5期；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263-268.

㉑宋志平：《翻譯：選擇與順應——語用順應論翻譯

研究》，北京：《中國翻譯》2004年第2期。

②2001年10月，胡庚申在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做了題為“從達爾文的適應與選擇原理到翻譯學研究”（From the Darwinian Principle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的講座。同年12月，他在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宣讀論文“翻譯適應選擇論初探”（*An Initial Exploration into 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該文後來以“譯論的繁榮與困惑——探索‘適應’與‘選擇’視角的譯論研究”為題發表在香港《翻譯季刊》2002年第3期上。不久，他又在*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11 (3)上發表英文論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譯即適應與選擇）。在上述講座和論文中，胡庚申始終沒有離開“適應與選擇”或“適應—選擇”這個模式。

③順應論的“選擇”（making choices / choice-making）

#### 參考文獻：

- [1] 胡庚申：《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上海：《外國語》，2009年第2期。
- [2] 胡庚申：《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翻譯生態體系》，青島：“翻譯學學科理論構建”高層論壇論文，2009年。
- [3] 何自然主編，謝朝群、陳新仁編著：《語用三論：

的內涵包括：a) choices are indeed made at every possible level of structure; b) speakers do not only choose forms. They also choose strategies; c) the term “making choices” may be misleading in the sense that it may invariably suggest a conscious act; d) choices are made both in producing and in interpreting an utterance, and both types of choice-making are of equal importance for the communication flow and the way in which meaning is generated; e) a language user has no freedom of choice between choosing and not choosing, except at the level where he or she can decide either to use language or to remain silent; f) as a rule, choices are not equivalent; g) choices evoke or carry along their alternatives. 參見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pp. 55-58.

⑤⑥王寧：《生態文學與生態翻譯學：解構與建構》，北京：《中國翻譯》，2011年第2期。

關聯論·順應論·模因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作者簡介：蔣驍華，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